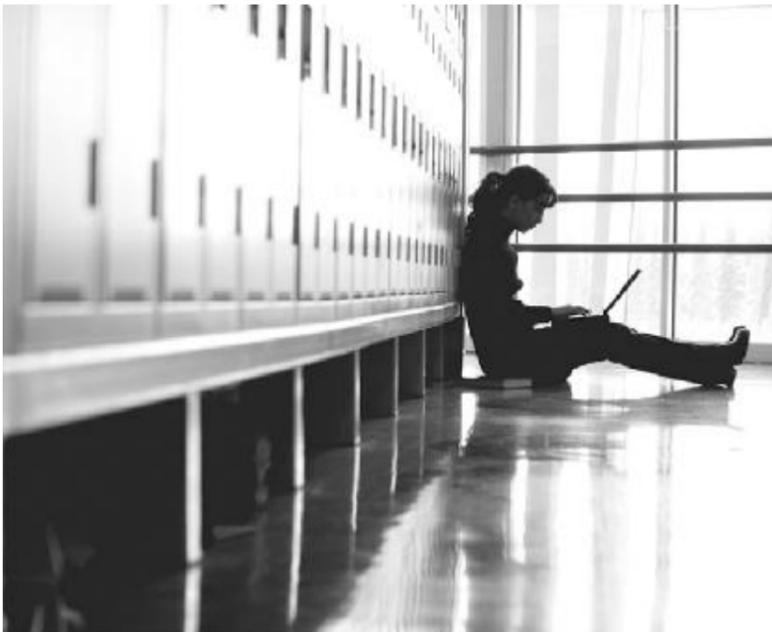


“校漂族”群体不断增多的趋势和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指出,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高校周围,“校漂族”已达数十万人。从某种程度上说,“校漂族”和大学资源开放是同一个问题,大学需要形成一个规范的、面向社会的开放机制。同时,“校漂族”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应该发挥管理的最主要作用。

“校漂族”漂向何方

■本报实习生 王珊 张文静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他们活动在校园的周围,仍然把自己当做学生,在学校自习、吃饭、上课,享受着学校所带来的便利;而在旁人眼中,他们是“蹭饭族”、“蹭课族”,是“外来者”,甚至是“不友好”的。这是一个不断扩张的群体,也是一个被学校和社会边缘化的人群。人们称之为“校漂族”。

“校漂族”已经从大学毕业,仍聚集在学校周围,或是考研、考公务员,或是准备申请出国,也有因没有找到满意的工作而推迟就业的,当然也有部分是惧怕进入社会而蜗居在学校周边。这样一个既存的群体,他们的权益由谁保障,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一庞大的人群?

“漂”在学校的日子

2月26日傍晚,汪哲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网页。今天是考研分数公布的日子,他想第一时间知道成绩。

“分数这么低,肯定过不了线了。”看到分数的一瞬间,汪哲特别沮丧。

这是汪哲第二次考研。“本科就读的学校实在很挫。”汪哲告诉记者,出于对未来职业发展的担忧,他选择了考研。第一年由于准备不充分,汪哲榜上无名。然而,他不想放弃。今年,他把目标设定为北京大学,在学校周围租了个房子,再战考研。

不足5平方米的小屋很是狭窄,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衣柜。这里却是汪哲梦想开始的地方。

吃饭、自习几乎是汪哲生活的全部。然而,这种简单的生活如今却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自习室进去要查学生证,每天换来换去,感觉自己像浮萍一样游荡不定。”汪哲坦承自己很沮丧。如今再战失利,继续考研,就意味着要继续“漂”下去。

像汪哲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尤其是近年来,“校漂族”这一群体的规模和范围更是不断扩大。“校漂族”大量出现的原因是多样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就业压力大是“校漂族”产生的重要原因。

“看待‘校漂族’不能一概而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说,“校漂族”的人数和待在学校的时间保持在一定程度上属于正常现象。但如果滞留的时间过长、比例过高的话,就应该作为需要重视的问题对待。

“学校人”还是“社会人”?

“本校的留校学生,如果想继续考研深造,我们很欢迎。”天津某高校就业指导中心主任刘元告诉记者,外校过来的学生最基本的信息都无从考察,其中不乏浑水摸鱼之人,难免对本校的安全管理带来隐患。

“校漂族”的涌入,会占据学校大量的资源,图书馆、自习室经常都找不到座。”南京大学研究生李树认为,“校漂族”既然已经离开了学校,就不应该继续占用学校的资源。

“外界称我们为‘校漂族’,其实我们哪里是一个群体?”汪哲说,几乎所有“漂”在学校的人都是独来独往,群体之间的交流其实很少。“一天看书14个小时,根本没有时间和人交谈。”

就业、出国、考研,“校漂族”承受的心理压力无疑是巨大的。而模糊的身份更让他们迷茫而纠结。

学生离开学校,本应该成为“社会人”,但是因为没有工作单位的接收,社会人的身份是不明的;待在学校里,却与学校不构成隶属关系,也不再是学校老师爱护的学生。“这种感觉就像是黑户。”汪哲的表情很惨淡。

“校漂族”群体到底有多大,目前为止,尚无权威的统计数据,然而这一群体不断增多的趋势和不断被边缘化的现象已是不争的事实。有专家指出,仅在北京、广州、郑州等地的高校周围,“校漂族”已达数十万人。

一方面是“校漂族”的数量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学校的管理愈发严格。这个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人群,他们的利益究竟由谁来保障呢?

谁是第一责任人?

“教育部早要把职业规划课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学校也在努力开展各种职业规划课程,但是总有学生表示不知道有这个事。”刘元说,“仅我们学校,每年毕业生中就有3%的学生不离校。”

刘元表示,学校的职业规划课和学生的反应就好像成了一个解不开的结。对此,他也很困惑。学校要对学生负责,但是对于这批早非学生的群体,又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看来,把学校作为“校漂族”的管理主体是很难的。“‘校漂族’的管理应该和家政、外来务工人员的管理一样,纳入社会保障部门的范畴。”他认为,客观上来说,学校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权利去管这些群体。

“要想保障一个群体的利益,首先要找到责任人。”《前线》杂志副总编、北京市高校毕业生就业促进会顾问祁金利表示,“校漂族”作为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纳入流动人口的管理体系,政府应该发挥管理的最主要作用,而弄清人口基数是保障其利益并为其服务的第一步。

“学校没有责任和义务来管理他们。”祁金利告诉记者,尤其是在北京等高教密集区,“校漂族”的情况更是复杂,很难分清他们是哪所学校的“亲戚”。

“‘校漂族’中,不乏有为改变第一教育出身的学生。”刘元说,因为部分用人单位对毕业院校“985工程”、“211工程”的限制,也造成一批人久困在一所学校中,他希望能够用法律途径来保障学生的基本权益。

“‘校漂族’不再简单地是学校层面的事情,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祁金利认为学生的就业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需要时间来满足需求的匹配。而在这个过程中,人才需求的不平衡可能使某部分人才过剩,这是导致“校漂族”群体产生的直接原因。

刘元表示,如果非得追究学校的责任,学校只能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提供一些帮助。

“校漂”之困如何解决?

“‘校漂族’与高校中短期性、非理性的专业设置密切相关。”储朝晖表示,这种现象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中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学校需要与市场接轨,理性对待专业开设以及院校扩张。

“从某种程度上说,‘校漂族’和大学资源开放是同一个问题。”熊丙奇认为,大学需要形成一个规范的、面向社会的开放机制。在这种机制下,学校为“校漂族”办理专门的图书馆进入证件和旁听证,方便他们的同时也可以规范化管理。“然而,这需要建立在征求校内师生意见的基础上。”

熊丙奇表示,学校需对开放时间、开放条件和开放程度作出明确的规定,避免损害在校师生的正当权益。

“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可以适当把工作范围延伸到‘校漂族’这个群体中来,特别是为其中一些经济困难或边远地区、农村生源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储朝晖认为,学校应该将重点放在就业指导工作上,但这并不意味着高校应该成为维护“校漂族”权益的主体,管理责任应更多地落在社区、民政部门或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上。

那么,政府和社会应该如何加强对“校漂族”的管理和引导呢?

祁金利认为,政府和社会要与学校加强沟通,对这个群体中的不同情况加以区分,让问题的解决更加有的放矢。“‘校漂族’是流动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这点,政府应加强房屋管理。”政府、街道和社区更应该在保障信息渠道畅通方面多做些工作,以便对“校漂族”的生存状况和问题作出快速反应。

采访手记

期待更加人性化的管理

“校漂族”不是一个正式的群体,就像他们的身份一样模糊不清,在这里,他们几乎没有交集,和在校的学生接触不多,仅是聚集在一个区域内各自孤独地生活。如果说“校漂族”不能把微弱的声音凝成呐喊的话,他们只会越来越沉默,直至悄然无声。

这是一个被边缘的群体,就像在采访中汪哲所说的:“我们被赋予了这样一个名称而不自知,我们需要的只是被理解,而不是标签化。”确实,任何问题上标贴以后,就失去了被作为个体考量的资格。当被谈起,只有“你们”、“他们”,而不是“你”、“他”。

对于这样一批已经不称之为学生的学生群体,采访时,很多专家建议把他们放到流动人口的范畴进行考虑,记者有些迟疑。他们尚未踏入社会,没有任何的处世经验,在迷惘踟蹰中慢步前行。这个人群太特殊,统一到一类人群可能更便于管理,但我们期待相关部门能够有更好的方法,能够更针对性地、更人性化地解决他们面临的诸多问题。

更重要的是,还是要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位授予制度改革。工程博士一起步就出现变异迹象,这表明我国大学的教育、管理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招生方面,不能严格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在培养中,不能做到严格要求;在学位授予方面,获得授权的学校授予的是国家承认的学历。这种教育管理、学位授予体系,为学校做文凭生意提供了空间。具体在工程博士项目中,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校各得其所——高管得到了博士学位,学校获得了不菲的学费收入,所谓“双赢”,而学校的声誉、教育的质量却严重受损。

与一名历史系学生的对话,让叶志明记忆深刻。上海大学转专业制度几经改革,只因为校方笃信“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在叶志明看来,我国高校的招生计划大多是拍脑袋决定,或有多少老师点多少菜。学生不报的专业自有服从调剂补充。“招生时不得已,招进来后就要想办法改变。”

类内分流后,上海大学冶金工程专业的一名本科生欣喜地说:“选专业,我终于做了一回主。”原来,他的高考志愿是家长选择的,选择的依据不外乎是媒体亲戚说什么好选什么。“虽然选择冶金工程的人不多,但我明白了自己未来的工作在哪儿。”

叶志明表示,学生转专业,首先要问清楚为什么。对待高考志愿录取不理想,希望重新选择专业的学生,转专业主要以成绩为主,鼓励学生通过努力获得选择权;确实不适合本专业学习的学生,比如理工科的学生凡是理工科课程成绩都不理想,学校则会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生的诉求调至其他专业。

兴趣固然是转专业的动力,可高校转专业难免出现经济管理“扎堆”的现象,导致一些基础性学科被忽略。

钱皓旻转专业时以第一志愿进入历史系,在他看来,与其选一个不了解、将来又不太可能工作的专业,还不如选一个感兴趣的。不仅可以学得轻松,还能在学有余力之际把精力放在二学位上。与此同时,他还得到了5000元的奖学金,持续3年。

叶志明告诉记者,对于历史、数学、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学校设定了最小招生数的后3年全额奖学金鼓励政策加以扶持,鼓励有兴趣者填报。只有第一志愿录取者,才能获得后3年全额的奖学金。如果设定了奖学金仍然招不满,这种情况学校不予保证。“绝对不把专业强加到学生头上,要让转专业成为一种市场选择。”

上海大学改革选专业制度——给本科生多次选专业的机会

■本报记者 温才妃

高考填报的志愿不如意,导致大学生颓废4年的情况在我国高校屡见不鲜。在上海大学,大一新生高考填报志愿前6个志愿的满意度仅是百分之四五十(服从调剂占相当的比例),可一年以后,学生的前3个志愿的满意度达86%,前6个志愿的满意度高达97%。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让学生有如此大的转变?

上海大学副校长叶志明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考生服从调剂去了一个从未听说过专业,或听从家长意愿、舆论误导去了一个不感兴趣的专业,大学应该给予至少一次的重选机会。

自2012年起,上海大学选择专业的政策发生了新变革——入学时实施三个大类招生,第一学年末在大类中进行专业分流,之后还可以跨大类转专业。如何把转专业机制做得更灵活,是上海大学校方一直思考的问题。

转专业不是一次就完成了

沈玉音理想的职业是法学,因分之差调剂到上海大学理学工学大类。如今,大二的她如愿以偿进入了法学专业,更为难得的是短短一年间她竟有两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据她介绍,该校按人文社科大类、经济管理大类、理学工学大类三个大类招生,大一学生学年末参加所属大类的“类内分流”考试,才能获得专业身份。

虽说不是二度高考,但专业分流也是有竞争的。想要选择大类中感兴趣的专业,就不得不重视高考成绩、大一学习成绩、综合表现,然后依据三者的综合成绩平行录取。其中,高考成绩、大一学习成绩各占45%,综合表现占10%。综合表现一项叶志明理想设定为10%的落差,但10%的落差“足以把歌唱比赛中,唱歌差的人变为第一名,唱歌好

的人判成最后一名”,最终校方决定10%的比例中,以2%的落差为宜。

“大一学生均需按照综合成绩进行分流排序,这是在大类中第一次选择专业。”分流排序后,沈玉音暂时选择了化学专业,但“喜欢化学的感觉总没有喜欢法学来得强烈”。

由于类内分流与跨类转专业的人数不对等,且类与类之间学生的综合成绩无法比较,类内分流结束后,跨类转专业才开始启动。去年7月初,沈玉音得知心仪的法学专业共有6个转专业招生名额,赶紧在网上报名,下载考试大纲。8月29日她参加考试,仅过了两天,她就接到了录取通知,兴冲冲到法学系报到。

沈玉音的转专业之路告一段落,但上海大学学生转专业的机会还没有用完。

“转专业不是一次就完成了,我们正在考虑本科四年均允许学生转专业。”据叶志明介绍,大二学年末转专业已实施多年,今年将为大三、大四学生转专业打通渠道。多次转专业的原因有很多,有的学生觉得再次选择的专业不适合自己,有的学生对学院的教学不满意,还有学生到了大四还想转专业,宁可重新读大一。

“允许学生多次转专业逼得院系激活办学活力,只有对学生负责,他们才会愿意留在本专业。”叶志明说,“以前在制度上不允许,现在我们就要允许。”

用一年时间挖掘学生兴趣

那么,如何在一年内让学生明确专业兴趣,减少再次错过的几率?学校动了一番脑筋。

上海大学历史系大二学生钱皓旻对大一时开设的通识课印象深刻。他曾选了一门“士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通识课,“这是一门文学与历史相

结合的课程,我通过名士的活动,了解到他们的观念,并引申到现实生活”。

钱皓旻表示,通识课的设置把某个学院的专业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宏观了解各专业,从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沈玉音则对院系开放日和新生研讨课更感兴趣。她曾参加了计算机与数学的院系开放日,学院的领导介绍了院系情况,我们还参观了专业教室、机房、实验室,优秀学生代表也为我们作了一对一的解答。由于个人原因,她错过了法学的院系开放日,但在新生研讨课上或多或少地弥补了遗憾。在不足30人的法学研讨课中,沈玉音得到教授一对一或一对多的交流与辅导,并在论文上得到指点。

而让学生选择专业心里最有底的是,专业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布了每个专业的开课课程、近3年的就业率、就业去向、就业单位类型、薪资等情况,薪资一项不仅公布了平均薪资,还公布了最高薪资与最低薪资。

“高中填报志愿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为了选专业开展的活动丰富多彩,让每个人身临其境。”沈玉音说。

正是因为身临其境的体验,学生在选专业上更加理智。叶志明举例,改革前,某些专业是第一志愿招满;类内分流后,不少学生知晓这些专业就业有困难,竟然也出现了个别专业招不满学生的情况。

让转专业成为一种市场选择

“历史系找工作困难,你为什么选择历史系?”“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学历史,去找与历史相关的工作肯定困难。但我喜欢历史,学到极致还怕找不到工作吗?”

中国大学评论

工程博士不能成为高校新的赚钱项目

■冰启

虽然国务院学位办明确规定,各试点“985工程”高校培养工程博士,不能再收学费,可记者调查发现,在今年已公布章程的“985工程”高校中,只有复旦大学明确提出2012年、2013年工程博士免收学费,上海交通大学对个别工程“领军”人才免收学费,中国海洋大学2013年工程博士学位学费总标准为2.7万元,中南大学工程博士学位每年1.4万元至1.5万元,有一所“985工程”高校研究生院负责人向记者透露:“部分兄弟院校的工程博士收费达到6位数字,与MBA、EMBA学员的收费相当,且不享受奖学金。”(2月19日《中国青年报》)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既然国家已明确招收工程博士不收学费,为何还有那么多的试点高校置规定于不顾照样收费,而且高收费呢?这样的工程博士培养已经出现异化,需要教育部门和高校高度重视。

工程博士的收费问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从这一项目推出起,社会舆论就担心它会成为高管、高官们读博的便利通道,以及学校贩卖文凭的又一途径。针对社会的质疑,国务院学位办曾明确要求“不得招收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攻读工程博士学位”,但高校是否收取高学费,让企业高管来混一张工程博士文凭的担忧还是存在的。

或许是基于这一考虑,教育主管部门提出了免费的要求,但从现在看来,有的高校的工程博士培养正朝舆论担忧的方向发展——把工程博士搞成一个像EMBA那样的赚钱项目,让老总先通过EMBA拿硕士,再通过工程博士拿博士,这样就“硕博一条龙”了。这样的工程博士培养,培养不出“工程技术领域领军人才”,倒会制造出新的钱学交易、学位腐败。

一边规定免费,一边却收费,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严格按不收费的原则进行监管、问责——对于高校的收费,教育主管部门不可能不知道;二是国家对工程博士的培养经费下拨不够,因此虽然有不收费的规定,但培养学校觉得经费困难,于是就收起来。对此,主管部门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实上,在此前国务院学位办表态不收费时,有高校就认为培养工程博士需要更高的培养成本,国家的拨款是不够的,因此要适当收费。

对此,解决的办法无非两种。其一,加强对学校收费的监管,严厉追查违规收费行为,如果不追究高校的违规收费责任,规定也就成一纸空文。其二,严格核算工程博士的培养成本,按照成本由国家保障相关经费投入。这对于避免由于培养经费不到位而产生的乱收费至关重要。即便未来工程博士项目要走收费培养的道路,核算培养成本也有利于其合理定价。我国EMBA、MBA培养项目近年来学费飙升,但培养成本却是一笔糊涂账——按照高等教育成本产品的属性,EMBA、MBA教育项目也应该坚持公益性原则,实行准成本定价的。

更严重的,还是要推进我国高等教育管理制度改革和学位授予制度改革。工程博士一起步就出现变异迹象,这表明我国大学的教育、管理问题已经十分严重。在招生方面,不能严格坚持教育标准和学术标准;在培养中,不能做到严格要求;在学位授予方面,获得授权的学校授予的是国家承认的学历。这种教育管理、学位授予体系,为学校做文凭生意提供了空间。具体在工程博士项目中,企业管理人员和高校各得其所——高管得到了博士学位,学校获得了不菲的学费收入,所谓“双赢”,而学校的声誉、教育的质量却严重受损。

只有推进学位授予制度改革,让学校回归教育和学术本位,才能重建招生、培养、管理的新体系。从这一角度看,一所学校是否培养工程博士,这其实是学校自己的事,与政府无关。政府部门可以制订人才战略规划,可以为相关的人才培养推出奖励措施,引导高校开设这样的培养项目,但却不适合指定学校试点。这种政府直接参与办学的方式也是导致问责不力(比如学校称,本就不想试点这一项目,是政府要求试点的)、质量难以保障(学校是否举办某种教育,需要结合办学定位、办学条件进行充分论证,不进行论证就按政府要求举办,质量是难有保障的)的重要原因。类似的问题已经反复发生,但主管部门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另外,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持续膨胀,包括硕士、博士数量每年招生规模已超50万,我国不能再实行学历由国家统一授予的制度了,而应该建立“学校自主授予,社会承认”的文凭制度。如果一名学生拿到的硕士、博士文凭本身不值钱,社会评价人才关注的又是能力和素质,持续办学的学校必定重视教育,而不是用文凭来忽悠学生。受教育者选择学校也不会只关注一纸文凭,而会重视学校有多少教育回报。这种新环境不建立,可以说,任何新的“学位项目”、“学位品种”都会发生异化,不仅难以为社会培养有个性、能力突出的人才,还会为“文凭工厂”增加贩卖的产品品种。